

史学纵横

美国“新清史”对巡幸制度的误读

◇赵云田

巡幸也称出巡，指最高统治者离开都城到某一地方巡行。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大多曾巡幸地方。虽然他们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巡幸次数多少、规模大小及其影响也有所区别，但都在促进民族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代表作《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增订本（张勉治著，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简称《马背上的朝廷》）对清代巡幸尤其是乾隆南巡进行了述说，企图“通过具体的实例，阐明在帝国核心和江南之间所表现出的以动态张力及持续性博弈为特点的多面关系”。然而，由于作者无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致该书对巡幸的内容和基本观点充满了误读。

加强朝廷与边疆的联系

《马背上的朝廷》首先阐述了“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并以秦汉唐代的事例，辽金等季节性迁移和明朝的巡幸加以说明。遗憾的是，这些叙述只是强调了“在十八世纪，巡幸这一古代礼仪制度承载着此前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征——在文武之间，君主与官僚之间，南北之间，汉人与‘蛮夷’之间”，并没有叙述巡幸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写出清代以前巡幸的真实内容和特点，特别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所以，其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5次出巡，“周览远方”“宣省习俗”，开启了皇帝出巡的历史。汉武帝在位54年间，曾34次出巡。例如，元封元年（前110）十月，他祭祀了黄帝陵。

隋炀帝在位14年，曾8次出巡。大业三年（607）四月，他第二次出巡。六月，到达榆林郡，匈奴启民可汗前来朝拜，吐谷浑、高昌等也派使者前来进供方物。隋炀帝在榆林郡的北楼设宴，招待各少数民族首领和文武百官。七月，启民可汗请求变换服装、袭冠带，隋炀帝诏示启民可汗拜拜时不可不通毡车，位在

诸侯王上。此后，隋炀帝又在榆林郡东城安设大帐，设御座，备卫士，建旌旗，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落3500人。宴会上，演奏了各个民族的音乐。隋炀帝还赏赐启民可汗及其部落各种物品不等。八月，隋炀帝离开榆林，亲自到启民可汗的帐房里看望。不久，启民可汗回归草原牧地。大业五年六月，隋炀帝来到张掖。高昌王曲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在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曼，款待高昌王、吐屯设，西域30多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作陪，气氛极其和谐。

唐太宗在位23年，曾多次出巡。贞观二十年（646）八月，巡幸灵州。在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部的少数民族首领遣使朝贡，表示“归命天子，乞置汉官”。唐太宗下令设置灵州。九月，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遣使到灵州的数千人来贡方物，并请设置官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可见，自秦汉起，中华民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皇帝出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朝廷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黄帝以统一华夏部落、加强同东夷和九黎族的联系而载入史册，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汉武帝祭祀黄帝陵，奠定了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隋炀帝北巡张掖，款待高昌王、吐屯设，西域众多少数民族首领作陪。唐太宗巡幸灵州，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11部少数民族首领遣使朝贡。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马背上的朝廷》无视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反而把巡幸视为“高度军事化”的行动，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征”，纯属主观臆断。

清朝巡幸超出以往历代王朝

《马背上的朝廷》企图通过巡幸分析清朝统治的建构，但对清代巡幸缺乏完整的叙述，绝口不谈中华民族融合的有关情况，所以其结论缺乏说服力。

“征服王朝论”错误辨析

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

自20世纪90年代，一些与日本学界颇有渊源的美国学者开始借助“征服王朝论”，夸大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对中国的大一统历史进行解构。在这其中，美国的罗友枝、欧立德等“新清史”研究者，打着利用满文档案等旗号，声称要“跳出中国中心论”，突出清朝所谓的“独特性”“异质性”，并将清朝视为扩张性的“满洲帝国”“殖民帝国”，进而解构清朝与中国的一体性，认为“中国”不等于“清朝”、“中国”仅是“清朝”的一部分。

忽视中国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

“征服王朝论”倾向于将中原居民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对立起来，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早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就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有着密切的互动。红山文化中的玉龙文化，更是影响至今。

在经济上，北部边疆也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畜牧业是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的。根据考古发掘，北部边疆的不少遗址就是先有种植业，后来才在气候变迁等因素影响下转向畜牧业。自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经阴山山脉、祁连山，直抵青藏高原东缘、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存在大量的农牧交错地带。著名的避暑山庄所在的承德，就位于农牧交错地带。

在政治上，中原王朝很早就将北部边疆纳入管理范围。武王灭商时，在东北活动的肃慎就进了楷矢鸟弩。因此，周景王的使者表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秦汉时则将辽东半岛纳入了郡县体制。之后历朝历代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北部边疆始终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

如何认识所谓“二元结构”

中国有着悠久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

首先，清帝巡幸颇为频繁，为以前历代王朝所不及。清代巡幸涉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六位皇帝。顺治八年（1651）至十七年，顺治皇帝1次巡行塞外，3次出巡京畿，22次去南苑。康熙八年（1669）至六十一年，康熙皇帝51次北巡塞外，6次南巡江浙，3次次巡辽吉，5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26次出巡京畿，33次去南苑，5次登临盘山，27次谒孝陵。雍正即位13年，1次出巡京畿，1次去南苑，7次谒东陵。自乾隆六年（1741）起，至嘉庆三年（1798）止，乾隆皇帝50次北巡塞外，6次南巡江浙，4次东巡辽吉，6次西巡五台山，5次出巡山东，1次出巡河南，9次出巡京畿，16次去南苑，32次去盘山，44次拜谒东西陵。嘉庆皇帝在位25年，19次北巡塞外，2次东巡辽吉，1次西巡五台山，10次去南苑，11次去西陵，24次去东陵。道光皇帝1次东巡辽吉，15次谒西陵，9次谒东陵。

其次，清代巡幸中有很多民族融合的事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顺治九年十二月，顺治皇帝在南苑接见五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途中，清政府以金册金印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宁瓦赤喇嘛达赖喇嘛”，开启了清朝册封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先河。由此，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地位和权威得以确立，获得了合法性，并且扩大了蒙古族、藏族之间的联系。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皇帝在北巡期间设置了木兰围场。康熙四十二年至五十二年，修建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皇帝北巡期间中华各民族交往的平台。乾隆二十三年元宵节，乾隆皇帝在南苑赐给萨克、布鲁特、塔什罕回人等观焰火，密切了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的联系。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在南苑德寿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进一步密切了藏族、蒙古族同内地的关系。这些都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背上的朝廷》对清代巡幸中民族融合的内容完全不提，显然是试图掩盖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丰富内容。

清朝巡幸促进中华民族融合

《马背上的朝廷》不提清朝巡幸对中华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故此我们有必要说说这一问题。

先从清帝北巡塞外来讲，一是促进了满族和蒙古族的融合发展。满族和蒙古族“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清朝入关后，满族贵族继续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并把公主、格格下嫁给蒙古王公。康乾每次北巡，下嫁的公主、格格和额附都纷纷前来请安、拜谒。二是促进了蒙古族和汉族的融合发展。蒙古地区有很多汉族人，其中有些与皇帝巡幸有关。正是在清政府的允许下，内地汉民纷纷前往口外。他们到蒙古以后，与蒙古族融为一体，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三是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乾隆北巡期间，多次宴请满族大臣、蒙古王公、新疆维吾尔族伯克、四川土司、台湾高山族首领和藏传佛教活佛，赏赉冠服、金银、缎匹等，实际上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种经济交流形式。

再从康乾南巡来说，加强了满、汉两个民族的交融。一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交融，主要表现为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尊崇。从汉武帝开始，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成为国策，在明朝时这一政策更为明显。带有鲜明汉文化色彩的儒家学说，在清朝也备受尊崇。康熙、乾隆南巡期间，多次到山东曲阜祭孔。清帝尊孔崇儒，既是满族和汉族思想文化交融的产物，同时又使这种交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交融，主要表现为对明太祖的礼敬。康熙之所以在南巡期间礼敬明太祖，重要原因之一是清朝许多政治制度沿袭明朝，“清承明制”。三是伦理道德观方面的交融，主要表现为对明太祖的加封。乾隆皇帝赐史可法谥号“忠正”，第六次南巡时亲到史可法墓前祭祀，从伦理道德观方面来说，是对“捐躯矢志，取义成仁”“忠义之诚”的褒奖，反映了满、汉两个民族伦理道德观的交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清史审稿专家）



重视。

忽必烈则委托中原士人设计了元上都和元大都，还极为重视中原的仁爱之道。1260年，他在即位诏书中表示：蒙古族兴起时，由于忙于征战，而“文治多缺”，今后要发扬“仁爱之念”“博施济众”。1271年，忽必烈还听取汉人谋士的建议，改变了过去多从封国、封号、官职中拟定国号的传统，在《建国号诏》中宣称：“诞膺天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这充分说明了元朝对中华正统和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清朝则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组织人力大规模进行整理文献和编纂书籍的活动。清朝兴起时，由于忙于征战，为历代之最，占到总次数的将近一半。曲阜孔庙著名的“万世师表”，即为康熙皇帝手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雍正皇帝还撰写《大义觉迷录》，强调清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天下一统”，并以“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等理由论证清朝的正统性。

也就是说，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纷纷学习当时较为先进和包容的中原文化与制度，推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并不断发展壮大。我们不能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试图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就否认其以正统王朝自居、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和吸收。

总而言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在部落林立阶段，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与北部边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夏商周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就得以很快确立并不断发展。“征服王朝论”不仅与日本侵华时的诸多谬论存在学术渊源，而且与此后的“新清史”存在密切联系。不管其提出者是无意还是有意地曲解中国历史，但客观上都是在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容易成为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影响国家统一的一理论工具。

（作者系内蒙古农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全荣

我国碑石林立，其中极具特色的要属多语种合璧碑。多语种合璧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多民族历史记忆的“石书”。多语种合璧碑既是民族交流互通的实物见证，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石刻”见证。深入挖掘多语种合璧碑的合璧之美，揭示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见证中华民族融合发展

多语种合璧碑一般是指一通碑上镌刻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的碑刻。多语种合璧碑大多数为历代皇帝的御制碑或圣旨碑，主要包括功德碑、记事碑、纪念碑、兴建或重修寺庙碑、诗赋碑等，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形制多样，因此，有人认为它可与中国古代“二十四史”相媲美。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中谈道：“金石之学……出于千载以前，犹如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

到清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呈现出多民族深度交往交流融合发展的格局。清朝在全国倡导和推广满、汉、蒙、藏等“多体合璧，多语并行”的政策，不仅统一组织人员撰写和翻译了一批重要典籍，还为有建树者立传、树碑，大量集多种文字于一体的碑应运而生。如满、蒙、藏、汉四体合璧《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等记事碑，记述了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的壮举，并赞扬了清政府安置它们的史实，切实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满、蒙、藏、汉四体合璧《实胜寺后记》《雍和宫喇嘛说》等寺庙碑，阐述了佛教人士爱国爱教、维护民族团结、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出的贡献，阐明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融合。

多语种合璧碑是民族交流互通的实物见证，展现了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往，是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共同文化根基。

记录中华文明演进历程

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

多语种合璧碑的形成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从文化传承上看，碑刻是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的重要载体，记录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功能上看，多语种合璧碑有其政治属性的一面，多种文字镌刻，凸显其“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理念。汉、满、蒙、藏四体合璧《御制十全武功碑》记述乾隆帝的十大武功，并颂扬清政府派兵入藏驱逐外国侵略者，巩固祖国边疆的事迹。《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记述清军在格登山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赞颂了国家统一的盛事。现立于韩国首尔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亦称《三田渡碑》）不仅是研究当时清朝和朝鲜关系的珍贵文献，也是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我国之间密切往来的“石刻”见证。

多语种合璧碑是凝聚国家认同与宣扬爱国精神的重要历史文化内容，更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维护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石刻”见证。多语种合璧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的外在表现形式，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特征。

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碑刻文献是我国民族历史文化的宝库，它保存了大量的书法篆刻艺术，也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研究历史上边疆地区民族关系、民族与宗教政策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一是有助于“补史之阙，正史之谬”，有利于还原历史原貌。碑刻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相比纸质文献极少出现误、讹、衍、脱、伪等现象，有助于“补史之阙，正史之谬”。有些清代多语种合璧碑的内容并不见于官修史书，有些虽收录于清史稿《清实录》等，但撰修者基于种种考虑，对碑文

多语种合璧碑见证民族团结

加以修改或剪裁，使收入官修史书的碑文与碑刻原文存在差异。碑刻文献是“同时期文献”，当事人写当时的事，真实性强、可信度高、断代清楚，所记载的内容最接近当时历史的实际面貌。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多语种合璧碑，有助于还原更清晰、更完整、更真实的历史面貌。

二是多语种合璧碑文相互印证，有利于准确解读碑刻全文。多语种合璧碑的不同文字内容可以相互补遗、相互印证，有利于准确把握碑文原义。如平定金川系列碑中，《御制平定金川勒铭美诺之碑》《御制平定金川勒铭乌围之碑》等由于年代久远，有些碑铭因自然风化，或遭受损毁，致使某些文字漫漶不清，难以辨识，不知作何解。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碑文之间可以比勘互证，更易于准确解读碑刻全文。

三是有利于考察民族语言词汇演变。多语种合璧碑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载体，文字是其“灵魂”，如文字混灭，碑刻也就如同“山野之石”，失去了它的价值。多语种合璧碑作为民间语言的活化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当时多民族文字词汇的构成与特点，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民族文字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有利于考察民族语言词汇演变和历史沿革。

四是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语种合璧碑产生于民族交往交流频繁的时期，不同的文字，相似的内容，在相互印证中诉说着那段相互交往和交流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石刻”见证。深入研究多语种合璧碑，发掘、弘扬多语种合璧碑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助于从历史深处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五是有助于传承与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多语种合璧碑文化遗产，不仅兼有文物保护与文献抢救功能，又能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如满汉合璧《木兰记碑》，赞颂了围场狩猎对于清朝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嘉庆皇帝无限感怀祖上荣光以及对自己的勉励和雄心壮志的表达，充分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只有详尽占有史料，经过去伪存真、反复推敲，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真面目。例如，北京白塔寺在1978年维修时，发现了乾隆皇帝放置其中的诸多重要佛教文物，官修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在《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中有详细记载。正确认识“石书”的史料价值，深入研究“石书”，对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真伪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多语种合璧碑由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保存分散、分布甚广、收集困难等原因，未能得到及时保护，导致磨损较严重、字迹漫漶不清，加大了研读难度。此外，研究者必须具有以深厚历史学功底为基础的复合型知识结构，需要具备解读蒙、汉、满、藏、梵、突厥、波斯语等语言的能力。正因为多语种合璧碑文晦涩难懂、学术壁垒高、学科语言要求高，碑刻资料搜集整理、研读研究工作开展不易。

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将多语种合璧碑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相关研究者甚少、成果匮乏。亟须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并细致深入研究多语种合璧碑的自然属性、文物属性、文献属性、文字属性、文化属性，挖掘其文辞所蕴含的历史传统文化精髓，扎实推进民族文化历史研究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

碑刻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其文化特色鲜明、学术价值独特。通过多语种合璧碑的研究，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阐释其所体现的“和而不同、合璧之美”的特征，探讨其在边疆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交往，更有利于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中国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22VLS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